

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生成的文化语境

申家宇

(河南师范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0)

摘要:任何一种理论话语都是特定语境的产物。现代传媒的广泛应用与市民文化的形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背景与学理背景为法兰克福学派所提供的特有认知模式、深植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中的欧洲古典文化传统所形成的他们特有的精英主义思维模式,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形成的文化话语语境。正是在这股合力之下,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呈现出强烈的批判色彩。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文化话语语境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540(2008)02-0156-03

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生成语境,学界讨论颇多。有学者认为是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对提高。伴随着以科学技术发展为基础导致的现代传媒的高速发展和普及,为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特有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学者认为是本世纪30年代后期的西方社会,娱乐工业蓬勃兴起,大众传播媒介迅猛发展。新兴的文化工业给整个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新观念、新时尚,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的精神面貌,这些都导致了法兰克福学派把眼光转向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模式的研究和评价;也有学者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在法西斯德国这一特殊社会语境中产生的,是以其成员的特殊经验为基础的;还有学者认为是美国大众文化的较法西斯主义极权统治更为隐蔽的伪装形式,使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意识到了批判的必要性。分析看来,各位学者都是从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的研究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的,笔者认为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一定社会历史语境的产物。但是特定的文化话语语境在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却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现代传媒的广泛应用与市民文化的形成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生成的两个重要文化话语语境

所谓西方话语语境中的大众文化是指借助电影、电视、广播、报刊、广告等大众传播媒介而流行于大众文化之中的通俗文化。它融合了艺术、商业、政治、宗教

和哲学等功能。在闲暇时间内操纵广大群众思想和心理,培植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以行使社会欺骗的功能。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话语语境,有两个最重要的环境。一是现代科技知识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广泛应用,科学思想和大众传媒浸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且以科学技术发展为基础导致的现代传媒的高速发展和普及,为大众文化需求的满足提供了物质载体。二是建立在西方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的形成。前者我们是注意到了的,后者我们却经常忽略了。

市民社会是指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原则,以自愿为前提、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文化活动以及议政参政活动的生存生活领域。它是社会成员生活的一部分私域和非官方公域的综合。契约性原则是市民社会运作的基本原则,是根植于市场经济之上的,是市民社会中公民人格独立、个性自由、权利平等的体现。在市民社会中,民众的市民意识具有以下特征:① 政治上的积极参与意识;② 经济上的强烈竞争意识;③ 日益强化的公共意识;④ 思想文化上乐于更新的理念。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市场经济息息相关,因为只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众才能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进而,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形成市民社会体系和诸如自由、公正和平等的公众价值观。市民社会中民众主体性价值的凸现是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因而,在市场经济的经济文化活动中产生的观念、利益和

作者简介: 申家宇(1972-)河南师范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06级硕士研究生。

文化需求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市民社会、市民文化的良性互动来协调和解决。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西欧国家为典型的西方市民社会相对进步的法治意识，包括法律意识、权利意识以及公平观念这样三个方面内容。它起源于古代地中海地区在商业发达基础上形成的法治思想和古希腊的城邦经验，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启蒙思想的召唤下又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以至发展到今天，形成了现代西方市民社会的法治理想。西方市民社会的法治理想至少包涵下列含义：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能够防止滥用政治权力；通过保护个人权利的要求确保个人优先；通过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确保普遍性原则优先于特殊性。这些法治思想和意识已深入到现代西方市民社会民众的价值观念和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他们文化生活的一种价值基础。而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就是在这种历史文化传统之上形成的，因此必然受到它的影响。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背景与学理背景为法兰克福学派提供的认知模式是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生成的特殊文化话语语境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非常暧昧的。一方面，“老年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理论成了阿多诺与本雅明剖析大众文化的重要武器，“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关怀又成了马尔库塞建构审美乌托邦王国的主要依据，以至于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与理念已经镶嵌于“批判理论”的总体设计中，并构成了“批判理论”的基本元素。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又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语汇（如阶级、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大众等）所指涉的对象及其作用产生了怀疑，并逐渐抛弃了马克思那种无产阶级因为经济剥削而必然起来革命、从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认知模式，自然，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大众也就与那种认知模式一起被抛弃了。安德森指出：葛兰西在意大利的与世隔绝与逝世、科尔什和卢卡奇在美国和苏联的隔离和流亡生活，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群众中活动自如的阶段已告结束。从此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以自己的密码式语言来说话了，它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愈来愈远，但它对于工人阶级的命运还是努力设法效劳并力求与之相联系的。

法兰克福学派远离无产阶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远离却是建立在他们对无产阶级的重新认识之上的。显然，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年代，无产阶级毫无疑问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大众是革命主体。然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和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资本主义社会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阿多诺把这个社会定位成“全面管理的社会”，而马尔库塞则进一步把它形象化地表述为“单维社会”。由于统治阶级通过

技术理性的力量把统治意识形态推进、渗透到了全社会的方方面面，马尔库塞曾作出如下判断：在大多数工人阶级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意识占着主导地位。当然，只有在革命的形势下，革命的意识才会显示出来；然而与以前相反，工人阶级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与革命意识的发展是相对立的。工人阶级中的绝大部分被资本主义社会所整合，这并不是一种表面现象，而是植根于基础本身，植根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之中的：宗主国的工人阶级从超额利润、从新殖民主义的剥削、从军火预算与政府的巨额津贴中分得好处。说工人阶级可以失去比锁链更多的东西也许听起来粗俗，但却是一种正确的表述。

如此看来，法兰克福学派对无产阶级的认识实际上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学说的改写或修正。在这种改写或修正过程中，他们先有了一个事实判断（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工人阶级取代了曾经革命的工人阶级），然后才有逻辑判断与思维方式的转换。而当大众社会的认知模式取代了阶级社会的认知模式之后，法兰克福学派也就不可能把无产阶级大众看作真正的革命对象了。法兰克福学派所谓的“大众”虽然在更多的时候指代的是中产阶级大众或商业意义上的大众，但却隐含了对无产阶级大众堕落后为中产阶级大众的失望与批判，其中的政治意味是不言而喻的。

对无产阶级的失望使得法兰克福学派把关注的视线不断地投向了个体，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自律的个体与顺从的大众）的思维模式，这为艺术与大众文化的进一步对立埋下了伏笔。于是，对大众的弃之不顾，对个体的拯救，犹太救世主义的渴望，政治行动主义的迷狂，皈依美学的冲动，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叙事元素，而大众文化就是在这样的特殊文化话语语境的叙事模式下被书写出来的。

三、深植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中的欧洲古典文化传统形成的他们特有的精英主义思维模式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形成的文化话语语境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在西方现代传媒的广泛应用与市民文化的形成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上形成的，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背景与学理背景为法兰克福学派提供的认知模式，使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思考有了一个特殊的切入角度（首先从政治，然后才是商业），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深植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中的欧洲古典文化传统，形成了他们特有的精英主义思维模式，从而使法兰克福学派展开了对大众文化的强烈批判。法兰克福学派遵循着一种文化发展的逻辑。在人文主义方面，它继承并发扬了西方早期人文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文化精神和工业文明理论的批判，是对近代文化启蒙的反思和检讨。在美学原理方面，它继承发扬了主体主义立场、歌德和席勒关于艺术中张扬个性和自由的反理性立场，是对文化艺术在审美

层面上的建构。在长期接受欧陆古典艺术熏陶的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真正的艺术应该具有深刻的内涵,具有独特的韵味以及超越、自由的特征,永恒、净化、和谐、优美、崇高、意象、意义追问等应是真正艺术的美学追求。然而,由于娱乐化、生活化的介入,大众文化的美学追求出现了令法兰克福学派触目惊心的转换,他们认为大众文化已经湮灭了真正艺术的本质和精神。

20世纪的30—40年代的德国和美国社会的文化状况基本上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美国欣欣向荣的文化景象对于这群深受欧洲古典文化的浸淫、有着贵族文化背景且长期与高雅文化耳鬓厮磨的法兰克福人来说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的文化素养与知识背景无论如何不可能使他们像美国的知识分子那样投身于大众文化狂欢的海洋之中。因此,从一开始,法兰克福人与美国大众文化的对峙甚至对它的敌视无疑是存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多是精英文化分子,以精英文化的价值标准为唯一标准,他们在学术研究中固守着精英分子的传统思维模式,呼唤对现实社会具有否定和批判作用的现代精英艺术,反对向现实社会妥协和顺从的大众文化艺术。而美国的大众文化一方面使他们进一步意识到了批判的必要性,一方面又唤醒并确立了已埋藏在他们心中的精英主义文化立场,从而帮助他们形成了艺术与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正是由于在西方现代传媒的广泛应用与市民文化形成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大背景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特有认知模式指导下形成的对大众文化进行思考的特殊切入视角,且由于深植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中的欧洲古典文化传统所形成的他们特有的精英主义思维模式等这些文化话语语境。才使得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呈现出强烈的批判色彩。无论当今的学者采取什么样的眼光、视角、方法与立场来审视,都不应该把这种理论的话语语境悬搁起来。我们只有把社会历史语境与一定的文化话语语境结合起来,才能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作出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以摒弃对于法兰克福学派人的思想简单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 金民卿. 市场经济·市民经济·现代化[J]. 宁夏党校学报. 1999(4).
- [2] 胡玉海. 市民意识与农民意识仁[J]. 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8(6).
- [3]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 民主的再思考[C]. 艾伦·S·科思, 苏珊·怀特[美]. 法制社会化对民主化的效应[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1998(2).
- [4] Herbert Marcuse: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pp. 5-6.

(上接第145页)就像是针对当下社会在说话。小说所具备的这种当下性,使沈从文等现代作家的都市小说的重新被发现和深入研究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且,“随着21世纪中国的现代化都市化程度的提高,沈从文的文化学意义也将日益增显”。

沈从文焦虑于文明发展中的弊病和困境,试图用他的“湘西世界”来为古老中国补充新鲜血液,着眼于“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在改造国民性这个向度上,他和五四新文学作家和左翼作家的启蒙与救亡情结合契了,显示出他文学创作的时代感和社会价值。沈从文自己实际上完成了对生命和生存困境的思考和探索,为人类远景凝眸,这正是人文学者的存在方式,和科技工作者一样致力于改善人类的状况。现代人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在文明与自然之间,身心不能和谐相处,在走向城市的进程中常常身心陷入困境:身在繁华都市,心在山水宜人的乡村。人们创建山水城市的梦想和努力,以及千里迢迢的观光旅游,无不表明人类心仪并且执著地追求理想和谐的文明。

沈从文都市小说的创作和接受表明:人类在走向城市的进程中存在困惑,但又一直执著地追求和谐的文明;文学与城市之间的纠结关系,正是作家视野和研究者视野的交融区。小说家以体验和想象来解释、虚构城与人,而研究者参照现实中的城市形象和城里人的生存状况,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推论来印证小说的合理性并阐释小说的意义。在这个作家——作品——研究者的三角关系中,作家和研究者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尺度通过作品媒介发生碰撞或者归于融合;期待视野的融合或分离,直接影响着研究者对小说的理解和阐释,即影响到小说意义的发掘和深化。接受美学认为,接受史既是不同读者之间的经验的交流,又是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而这种交流和对话的产生,则意味着人们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问题与困惑,意味着对新的城市形象书写的期待,人们试图构建理想社会的努力不曾中断,而且对诗意及和谐的期待也越来越迫切。“城市是人自己的成果,城市应该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家’,一个好城市能够成为人类灵魂的家园。”社会学家的愿望同样具有诗情画意,代表了人们共同的心声。

参考文献:

- [1] 李俊国. 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2] 吴福辉. 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
- [3] 刘洪涛. 文学与城市复杂关系的一个考察——沈从文在上海. 上海文化, 1995, 5.
- [4] 罗成球. 沈从文构筑的都市世界: 论沈从文的都市小说[J]. 求索, 1992, 3.
- [5] 金元浦. 文学解释学[M]. 长春: 东北师大出版社, 1997.
- [6] 赵学勇, 崔荣. 片面的深刻——论沈从文的都市小说[J]. 吉首大学学报, 2004, 3.
- [7] 杨联芬. 沈从文的“反现代性”[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 2.
- [8] 范家进. 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M]. 上海: 三联书店, 2002.
- [9] 陈厚诚, 王宁编. 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C].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 [10] 张鸿雁. 总序——中国城市社会的来临[A]. 张鸿雁主编. 城市·空间·人际——中外城市社会发展比较研究[C].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3.

编辑: 冯惟策

编辑: 冯惟策